

持續地回家： 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移居生活

鄧建邦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相當多的跨界專業工作者，在跨界移居後，並不是呈現固著、不流動的生活型態，而是週期性及頻繁地往返移居地與移出地。本文以前往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為例，探討跨界專業工作者之移居生活。文章理論主要連結到跨國主義的觀點，以補充對於專業工作者遷徙的討論，向來忽略微觀層次之移民生活面向。經驗資料主要來自於三階段的田野研究觀察，以及 52 份台籍經理人員與 4 位台籍經理人員配偶的敘事性訪談。本文指出，移居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雖依不同遷徙動機或過程，可區分為三種遷徙模式：長居上海型、工作停留型與跨界聯姻型，但這些專業工作者跨界後，都呈現頻繁地來回跨界移動，並透過運用兩地的物質性與社會性資源，及跨地域的社會網絡，編織多重地域連結，呈現一種穩定的跨界生活型態。這種在移居生活中，刻意強調持續性的社會慣行、象徵體系與物質文化面的跨界實質聯繫，凸顯作為跨界專業工作者的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既不是世界主義觀點下的無疆界菁英，也不是離散觀點下無處為家的離散者，而是持續性回家的跨境遷徙者。

關鍵詞：專業工作者、移民研究、台商、離散、跨國主義

Making a Living on the Mov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aiwanese Managers in the Shanghai Area

Jian-Bang D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Many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do not begin a fixed or immobile livelihood after migrating to a host country. Instead, the tendency is to show a continuing and two-way movement in a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This paper analyzes 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transnational professionals: Taiwanese managers in the Shanghai area.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s drawn from transnationalism approaches that complement the prevailing focus on the movement of professionals, which is categorized as a "brain drain/gain or circulation" between sending and receiving countries, and leading to the neglect of analyzing migratory process at the micro level. Empirical data for this study are generated from a three-stage field research, in which narrativ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52 Taiwanese managers and 4 of their spouses.

Using typological analysis, three different migration patterns of Taiwanese managers were distinguished: 1) long-term settled 2) for-reasons-of-job settled, and 3) cross-border marriage. Nevertheless, these professionals are common during the migratory process, meaning that they continually travel back and forth between societies of origin and settlement to use local material and social resources, establish transnational social networks, and span pluri-local connection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ir having stable, transnational lives. The emphasis on the transnational linkage of social practices, as well as both symbolic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n migratory lives, could serve as indicators explaining why Taiwanese expatriates in the Shanghai area are neither cosmopolitan elites nor homeless diasporas, but rather, transmigrants who continually return home.

Keywords: skilled workers, migration studies, Taiwanese businessmen, diaspora, transnationalism

一、導言

我們在上海也買過房子，但自己從來沒住過那個房子，都是用租的，公司租到哪裡，我們就住到哪裡。……但哪怕是用租的，我都把它當作是我的家，缺什麼東西，我一定補足。……現在啊，因為我來了三年，我覺得這裡比較像家，回台灣是回我公公婆婆的家。……但我不願意在這裡消費，我會回台灣消費，……我週遭的朋友都是這樣。（訪談編號 T023, 2006）

這是一位跟隨任職外商公司台籍經理而移居上海的年輕安美太太，描述在跨境遷徙後的生活。如同其他估計約 30 至 40 萬移居大上海的台灣人，¹ 儘管已長時間生活在移居地，甚至把上海視為自己主要的住家，但這些移居者卻仍頻繁來回於移居地與移出地之間，進行各項物質與其他社會資源的交換。

許多傳統移民研究指出，移民是個除根的過程，不僅遠離自己熟悉的家鄉，進入移居地後往往還須經歷痛苦地適應新社會與新文化的過程。同時，移居過程通常也是一次性的，方向是單一箭頭式的 (Gordon 1964; Einsenstadt 1953)。然而，上述移居上海的案例，卻沒有呈現除根的現象，移居過程也不是一次性的移動。如果這種現象的解釋主因是兩岸文化的親近性，如同早期台商不約而同地指出「語言風俗與台灣相同，易於溝通」，或「語言、文化沒有隔閡，即如在國境」，是偏好選擇大陸為投資地的重要因素 (林祖嘉 1993: 53；經濟

1 胡蘇雲(2006: 126)參照上海地區台商協會的數據，推估在大上海地區生活的台灣人，可能高達 30 至 40 萬人之多。之所以為「可能」，乃因有高達 80% 以上在上海地區的台灣人，沒有向當地官方辦理暫住登記，所以不管是上海公安部門或是統計局的資料，目前都無法提供「準確的」人數。

部 1994: 4) ,² 這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 當台資公司進行境外投資設廠, 或提供境外工作機會時, 台籍工作者普遍並不排斥前往中國大陸(Tsai and Chang forthcoming), 以及, 移居後相對較容易改視移居地為自己主要的住家。但它無法解釋, 為什麼移居者在移居後, 仍要花用這麼多的精力、時間與交通成本, 持續地維持與家鄉的連結? 為什麼他們在跨界後, 仍會經由頻繁地跨界移動, 努力經營同時橫跨兩個地域的社會聯繫(social ties)? 顯然, 要解釋移居上海的台籍工作者在日常生活型態中, 高頻率地來回移居地與移出地, 持續保留與原移出地的連結, 及經營同時橫跨兩地域社會聯繫的現象, 需要另一種解釋觀點切入。本文研究目的即借用移民理論晚近發展的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³ 觀點, 觀察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日常生活型態, 以解釋上述的移居行為。本文論證, 以移居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為例, 他們進入移居地後大多沒有切斷與原移出社會的聯繫, 也沒有強烈意圖轉換自己的關聯架構, 整合為本地人的打算。儘管, 移居的台籍經理人員在遷徙的動機及過程有不同的模式, 卻都在生活型態上具有多重地域連結, 進行跨界的生活。

為了與既有的移民研究有更多對話, 底下, 本文在討論大規模跨界流動前往上海的台商 / 台籍經理人員現象之前, 先處理晚近的移民研究, 尤其是跨國主義相關文獻的幾個重要觀點。然後, 經由田野研究資料分析的類型化, 敘述三個具有類型意義的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跨界移動個案, 討論台籍人員不同的跨境遷徙模式, 及移居生活中共同的特殊性。藉此, 嘗試解釋跨界專業工作者移居生活所具有的理论意涵。

2 根據經濟部(1994)委託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針對台商赴大陸投資所做之問卷調查, 有高達 73.4%受訪者認為是「語言、文化沒有隔閡, 即如在國境」, 僅次於「勞工充沛, 工資低廉」(86.95%)選項, 為台商、台資設廠之主要利益考量或動機(該問卷中本題設計為可複選)。

3 關於"transnationalism"的中文譯法, 為求概念的一致性, 本文採用王宏仁、郭佩宜(2009)一書的翻譯方式。但此概念主要指出「跨境」的意涵, 所以在內文中"transnational migration", 譯為「跨境遷徙」, "transmigrants"譯為「跨境遷徙者」, 而"transnational lives"則譯為「跨界生活」。感謝審查者之一提出的看法。

二、世界主義、離散與跨國主義 的移民觀點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一方面促成資本的快速流動，最直接表現就是外國直接投資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則是相應於資金的全球流通，促成大量的勞動人員跨境遷徙的現象。所以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只加快了人們移動的步伐，同時也加速跨越國家邊界移動的勞動移民。

然而，目前有關勞動移民的研究，仍是以低階或非技術移工(less-skilled or unskilled migrants)為主要對象，對於屬技術勞工(skilled workers)跨界移動或移民的討論，則顯得相對貧乏。這一方面是低階勞動者的跨界移動受到國家嚴格的邊界管控，以及跨界後在遷移地社會必須面對來自階級、性別、種族、族群等面向的歧視與差別待遇，所以其中的不平等與支配性不對稱關係引發大量的學術關注(Massey 1998; Smith and Guarnizo 1998; Castles 2000; Kaur and Metcalfe 2006)。相對的，作為專業工作者的技術移工，他們的跨界則容易被視為是一群跨國資本家階級(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Sklair 2001)，或是假定為是一群優勢的遷徙者(privileged migrants)，因此探討的焦點往往側重如何在國際的政經秩序中，創造金融資本，扮演全球城市的菁英(Beaverstock 2002, 2003; Gritsai 2005)，而相對忽略其移居生活受限制的面向；儘管這樣的觀點晚近遭受到較多的挑戰（參考 Favell et al. 2006; Fechter 2007; 鄧建邦 2008a）。

可能正是如此，所以在移民研究中，如 Melissa Butcher (2006: 173) 指出，跨界專業工作者(transnational professionals)似乎與移民研究處於一個頗具問題性的關係，因為許多移民研究並不認為如外派人員(expatriates)之類的跨界專業工作者「需要」移民。

"expatriate"拉丁文原初的字義，指的是生活在自己原國家之外的人(Fechter 2007: 1)；在晚近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的討論中，才運用此概

念去指涉接受公司調派往境外赴任的人員。確實，並不是所有具有外派人員特徵的跨界專業人才，都可視為是一群移民。Butcher (2006: 173)建議將跨界專業工作者區分為兩類：一為生活基地仍在特定母國，但工作關係進行經常性區域間移動的跨界巡迴者(transnational itinerants)；另一為已經，或打算離開自己原生國家⁴超過一年以上的外派人員。對於後者而言，Butcher認為，他們不僅在移居地有長時間的停留，許多甚至有多數年的經驗，而且經由他們強化的流動觀(heightened sense of mobility)，創造出一組新的動態(dynamics)。

本文所探討的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不是上述第一類短期性來回區域間穿梭工作，或是短期性（如三個月期）支援的台籍人員，而是已經移居大上海一年以上，或與所屬公司簽約工作期一年（含）以上的台籍經理人員。這群不管是屬於外派或是在當地應聘台籍經理人員的遷徙，由於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或專業、管理知識的技術移工特質(Salt 1997)，在本文中視為是一群跨界的專業工作者。同時，他們的跨界都非短期性的，而是屬長駐性質，擁有與移居地長時間的互動與接觸，甚至許多個案如安美太太描述的，具有舉家遷徙的情形，所以可視為具有某種定居形式的移民。

對於這群跨界專業工作者，從人力資源的角度，有較多針對他們的討論，不過多著重在技術勞工的移出究竟是造成輸出國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影響，還是人才循環與交換(brain circulation/exchange)的效果(Saxenian 1999; Hunger 2003)。這樣的討論框架，重視的是從鉅觀面探討技術勞工跨界移動對移出國及接受國的影響，但沒有關照到專業工作者遷徙的微觀層面。此外，許多有關專業遷徙的討論，如John Salt (1997)及Robyn Iredale (2001)的研究，雖然從職業別，或是從遷徙的動機、移出地與目的地、遷移管道與機制、停留時間及融入模式等，區分不同的技術移民類型，但也沒有進一步從行動者微觀層次，去指出專業工作者的移居生活是如何進行的。

4 Butcher (2006)研究的是從澳洲前往新加坡的專業工作者，所以內文中的原生國家指涉澳洲。

有關專業工作者的移居生活，一種看法是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觀點。比如，Ulf Hannerz (1990, 1996)指出，全球化產生愈來愈多在人與人之間、不同文化及地域間的跨國連結、互動與交換關係，也因此造就一群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s)，他們不僅有能力來回世界各地移動，也有高度意願參與各地的文化。Hannerz (1996: 108)稱這群世界主義者為一新階級，因為他們普遍具有去脈絡限制的文化資本。如駐外新聞特派員，透過為主流媒體撰述成為當今意識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consciousness)的關鍵製造者，且透過民族誌式的報導積極參與各地的生活，即是這群新階級的最佳範例(Hannerz 2004)。

然而，不管是把跨界遷移的專業工作者，視為具有菁英身分的新階級，或是具有世界主義態度的觀點，晚近都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看法。Adrian Favell 等(2006)及 Anja Weiss (2006)的研究，就指出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技術勞工的跨界移動有從菁英向下大眾化、中產階級化的趨勢。曾熾芬、吳介民(2006)的研究，也發現前往大陸的台籍工作者愈來愈多樣性，其中也包含低階白領及灰領層級的台籍人員。所以，世界主義的觀點似只合適解釋特定專業遷徙的人群，而且也有假定專業工作者的跨境遷徙是過著一種「無疆界生活」(borderless lives)的盲點(Fechter 2007: 23)。

另一種常用來解釋遷徙人群的看法，則是有關離散(diaspora)的觀點。不管是遷移海外的華人社群(Ang 2004)，在不同國家生存的華人企業家(Gomez 2007)，因國共內戰遷台的外省族群、大陳島居民(趙彥寧 2001；張茂桂 2006)，或是離開台灣原生社會，跨海到東南亞另尋生存之道的台商(龔宜君 2005)，都常被視為是一群「離散者」。根據 Floya Anthias (1998: 557)的界定，離散意涵著在全球化脈絡下產生的跨界移動與連結，以及在當代世界所增長的跨國族連帶(non-nation based solidarities)。Anthias 認為，全球化已大幅地轉化人群間的關係，所以建議以離散概念取代傳統使用的種族及族群概念，重新去思考跨界移民與族群關係。確實，以離散觀點觀察跨境遷徙的

專業工作者，有助於觀照這群跨界人群如何經由遷徙的過程，形塑跨界的連結。但離散概念首先意指著播撒或散布種子(to sow or scatter seeds)，蘊含人群從原中心往邊緣地散布的意義(Brazier and Mannur 2003: 1; Mayer 2005: 9)，所以諸如流浪、返回家鄉的想往、共同族群根源的預設等，常是運用為形容離散群體的重要特性（趙彥寧 2001；張茂桂 2006；Panayiotopoulos 2006: 14；王宏仁、郭佩宜 2009: 4）。Robin Cohen (2008: 17)也指出，離散群體的共同特徵包含從原鄉往兩個、或多個異地區域的散布，且常具有創傷性(traumatical)的經驗，以及擁有對家園的集體記憶或迷思等。

但是，當代專業工作者的跨境遷徙，往往與創傷無關，而有更多是連結到個人的機會(Reden 2000; Butcher 2006)。而且，如果把離散的觀點放到跨界專業工作者上，焦點就容易轉移為觀察移居者的流動生涯，不同地域的離散者如何共同想像家園，或側重其與家鄉的單向聯繫，無法觀照到跨界專業工作者在移居生活中努力經營同時橫跨兩地域社會聯繫的事實。⁵

晚近的許多移民研究指出，移民現象不再能只從一次或兩次性的，在兩定點間（移民的起源地及目的地）的移動去進行觀察，因為更多移民表現出來的，是經常性來回於兩個區域間的移動，或甚至是在三個點間的頻繁移動(Wong and Ng 2002)。這樣經常性的流動，對移民個人來說並不必然就是暫時的、過渡的形式。Ludger Pries (2001)認為，更好的解讀方式，應該把它當成實然的形式，是真實地構成移民連續性整體生活中的部份。而且，移民流動形塑的空間型態是多重地域的(pluri-local)，如此般的國際移民重點乃在於「跨」國境的(transnational) (Pries 2001: 49; Levitt and Waters 2002: 7)。

由此得出的跨境遷徙者(transmigrants)，移動的範圍是由數個結構化社會空間延伸的組合而成。這群移動人群有二個基本特徵，一方面他們是「跨越」民族國家邊界進行移動；但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是無

5 關於此小節跨國主義與離散及世界主義觀點的對話，作者受惠於編委會與審查人之一的意見，在此感謝他們寶貴的看法。

所不在的「跨越」，到處都可去的。

上述這種強調以「跨境遷徙」概念來取代傳統對移民的了解，把「移入移民」與「移出移民」放到一個新的認知架構重新省視，主要就是晚近移民研究中的「跨國主義」觀點。從九十年代開始，Nina Glick Schiller 等(2004[1992])及 Linda Basch 等(1997)著作引發了移民研究中有關跨國主義的論辯，在他們的理解中，跨國主義的出發點立基於四個假設：(1)跨境遷徙與全球資本 - 勞動關係相互連結一起，只要全球資本主義持續發展，跨境遷徙就不會停止；(2)跨國主義應該視為一個過程，且在這個過程中，移民經由他們日常實踐及社會、經濟與政治關係，建構跨越民族國家的社會場域；(3)社會科學中與族群、種族及國族有關的概念，不只會限制我們去發覺跨國現象，也使得研究者無法合適及充分地分析跨國現象；(4)跨境遷徙者在跨越邊界的生活，必須要面對不同民族國家的民族建構方式，也因此必須與不同的想像（如族群、國族與種族想像）相互斡旋(Basch et al. 1997: 22)。

跨國主義觀點的提出，主要貢獻之一是突破社會科學研究中長久以來囿於「方法論上國族主義」的限制，跳脫以容器式的社會觀點來審視移民現象(Nassehi and Schroer 1999; Wimmer and Glick Schiller 2003; Beck 2004)。例如，Basch 等(1997)的研究觀察到，跨境遷徙的人員離開自己所屬的國度生活，不見得就必然等於放棄原生社會的一切。Thomas Faist (2000a)的研究也指出，移民及再移民，可能都不是最終的、不可變更及不可逆的決定。即使那些長期離開母國的移民或難民，他們常也具有相當強的跨界連結。基於此，Faist 主張以跨境空間(transnational spaces)的概念，來掌握跨邊界的動態社會過程，如同 Pries 使用跨境社會空間(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概念去指涉一結合多重地域的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透過此參考架構同時結構化移民個人每日的生活實踐、生涯計畫、社會位置及認同，而且也超越傳統以民族國家限定的疆界(Pries 2001: 23, 28)。

但問題是，為什麼移民要形塑及維繫 Faist 所謂的「跨境空間」，或是 Pries 指稱的「跨境社會空間」？為什麼移民的跨界移動，不是

從一個民族國家的「容器」，轉換到另一個「容器」就停止了？是因為當代交通的便利性，促成來回跨界的移動成本及所需時間大幅降低？還是溝通科技的發達，使得遠距聯繫變得容易且負擔低？抑或，移民金錢匯兌事業提供相當程度的可信賴性，所以移民可以不斷匯款回自己老家？確實，這幾個因素提供了移民、及與移民有關的資訊與金錢「方便」跨國的解釋，但正如 Luin Goldring (1999: 163)指出的，它們都只能是促成跨國主義的工具(means)，而不是原因(reasons)。

Basch等(1997)分析從海地、聖文森、格瑞那達及菲律賓到美國的跨境遷徙者指出，由於他們(1)面對經濟及／或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為了確保移民家庭可以持續地生活無虞；(2)在母國有些跨境遷徙者群體會遭受社會排除；(3)及在目的地的美國社會，同樣要面對被以不同種族的方式對待，使得移民必須藉由跨境社會空間的創造，以維繫及改善自己的經濟條件，增強尊嚴，進而強化、提升自我地位。Goldring (1999)針對墨西哥到美國的勞動移民研究也指出，跨境遷徙者建構跨境社會空間，其實與資源、權力及社會位置的確立有很大的關係。

本文藉由跨國主義強調的行動者取向觀點，以及跨境遷徙者會主動尋求跨界的多重地域連結，以面對在移居地社會生活的挑戰，來觀察作為專業工作者的台籍經理人員跨界後的移居生活。

三、研究背景： 台商、台籍經理人員與大上海

提到台商，讓人很容易聯想起，一個個企業主拎著皮箱，裡面裝滿公司生產工業成品樣本，使用不甚流利的英文，到世界各地尋找客戶，洽談生意的景象。這個常民對早期台灣生意人的印象，對應的是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出口導向經濟發展形態。這些中小企業帶動了台灣八〇年代的經濟奇蹟，累積了高額出口的外匯剩餘，但八〇年代末期開始卻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本地勞動力成本節節上升、勞動力嚴重短缺、台幣大幅升值降低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以及美國的

保護主義等，都替台灣中小企業的繼續發展設下許多不利的條件(Wallraf 1996: 20)。尤其是屬勞力密集、與對環境造成高負擔的產業，更是受到嚴重的衝擊。面對這些問題，許多台商採取的解決對策是轉移生廠基地，首波前往東南亞國家，接著前往中國的經濟特區及其他沿海經濟開發程度較佳的大城市，藉以尋找事業的第二春。可以說台商現象的出現，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台灣作為半邊陲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分工位置，有著極密切的關係（鄭陸霖 1999；龔宜君 2005）。

在台商前往中國的投資過程中，王振寰(1997: 9)指出，第一波是前往南中國的珠三角地區，以簡單加工出口、資本小、勞力密集的產業為主，緊接著 1993 年後第二波外移中國大陸的台商，則以技術密集、資本規模較大、簡單加工出口裝配輸出，轉變為上下游關聯企業整廠輸出，投資地也由中國南部逐漸向北。耿曙(2002)認為，從第二波外移台商開始，以大上海地區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便逐漸成為台商在大陸的另一個投資重心。而且在這波隨台商前往中國大陸工作的台籍經理人員，有愈來愈多受雇於高科技產業、金融物流等服務業；台籍經理人員不只出現在台資企業中，也有愈來愈高的比例受雇於外商跨國企業，或是當地的陸資企業。

如果說第一波前往珠三角台商基於地緣關係考量與強調加工出口的產業特色，那大上海為什麼又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據統計，截至 2006 年底為止，把地區總部設置在上海的跨國公司有 154 家、投資性公司 150 家、外資研發中心 196 家。⁶ 上海已成為香港之外，在中國內部吸引外資總部經濟項目最多的城市。此外，在上海的人口組成中，據上海統計局的資料，2006 年常住人口共有 1,815 萬人，屬戶籍人口 1,348 萬人，而常住外來人口（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高達 467 萬人，約占四分之一強的比例。⁷ 如果把其他非中國內地常

6 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8)。

7 參考上海市統計局(2006)上海統計年鑒 2006，表 3.4 主要年份常住人口。

住人口，⁸ 以及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下的外來人口也一併計入，⁹ 上海外來人口其實達到城市總人口的 32%，或甚至遠超過這個比例。¹⁰ 這樣的都市特徵，就如同 Saskia Sassen (2000: 25-26) 指出的，當代全球化過程出現的一些大型城市，不僅是作為全球資本集中的策略點而已，同時也包含了勞動者組成的跨國化。Sassen 把具有這樣空間特性的城市，稱為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可能也正因為上海地區作為一個新興的全球城市，相較於其他中國的城市，可以更大量吸引高科技外資廠商前往投資，成為全球跨國公司及跨國菁英最嚮往投資及工作的城市之一(Fu 2001；簡博秀、周志龍 2002)，以及內地各省份居民進行城鄉移民遷徙的一個主要指引路徑(Roberts 2002; Wang et al. 2002)；¹¹ 台商作為全球商品鍊的一環，當然也不例外，於是在上海熱潮的推波助瀾下，吸引大量的台商及台籍人員前往投資及工作(Tseng 2008)。

從表一中確實也可以看出，2008 年大上海地區¹² (包含上海市及蘇州，昆山及吳江地區) 台商協會會員數已逾 3,300 家。儘管，此數字與深圳及東莞台商協會會員數 (分別約為 2,000 及 3,600 家) 的總和，仍有一段差距。但從大上海地區台商協會從 1997 至 2008 年，九年時間會員數成長了 7.6 倍，¹³ 相較之下，深圳及東莞地區台商協會

8 包括來自港澳台灣「常住的」1.5 萬人，及外國常住人口 12 萬人。港澳台數據部份，乃根據 2005 年上海統計年鑒中 2004 年「在滬工作、居住的港澳台、境外常住人口」數字。其中，香港常住上海人數為 3,505 人，台灣常住人口為 11,818 人 (參考上海市統計局 2005)。但上海統計局在 2005 年後，即將「主要年份在滬工作、居住的港澳台、境外常住人口」統計項目刪除。而關於外國常住人口部份，參考上海市統計局 (2006) 上海統計年鑒 2006，表 3.13 在滬外國常住人口。

9 約 160 萬人，數據來源同註 7。

10 這主要是依據官方上海統計局或上海統計年鑒的資料，由於資料只提供在上海工作居住的港澳台及境外「常住」人員的數據，所以對實際在上海的港澳台及其他外國人數，數據呈現的應是相當低估的情形。

11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2008) 的資料，上海在居民消費水平、職工平均工資等指標中都取得第一。

12 本文指涉的大上海地區，除了上海市以外，尚包括上海市幅員周邊的吳江、昆山及蘇州等區域。這樣的界定，基本上是跳脫中國大陸官方的行政地域作為劃分依據，而改以「上海大都市圈」的方式，來界定此範圍 (胡蘇雲 2006: 125)。此區域的特殊性，對本研究而言，在於台商的高集中性，以及表徵一般台商認知中所指稱的「上海」概念。

13 由海基會提供的《大陸地區台商協會會員名錄》，於 1997 年「蘇州台胞投資企業協會」收錄的資料，當時蘇州台商協會的會員除蘇州地區外，尚包含昆山、吳江、張家港、長熟及太倉地區 (經貿服務處編 1997)。之後，昆山於 1998 年、吳江於 2003 年、

會員數僅上升 2.8 倍，¹⁴ 且大上海地區企業有更多屬大型企業來看，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包括外派及自行應聘赴任），已成為該地區因工作而長住的主要台籍社群。

表一 大上海及珠三角（深圳／東莞）地區台商協會會員數之比較

區域	城市	1997 年	2008 年	當地台商協會成立時間
大上海	蘇州	191	655	1995
	昆山		1,126	1998
	吳江		200	2005
	上海	245	1,325	1994
	小計	436	3,306	
珠三角	東莞	1,190	3,600	1993
	深圳	797	2,000	1990
	小計	1,987	5,600	

資料來源：1997 年資料，見經貿服務處編(1997)。2008 年資料來自以下不同協會的網站資料，上海台協會員數參見上海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蘇州、昆山、東莞台協會員數參見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吳江台協會員參見吳江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深圳台協會員數參見深圳台商協會。

註：蘇州台商協會於 1995 年成立時，會員也包含昆山及吳江地區之台資企業。

四、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 移居生活的類型分析

（一）資料的來源與特徵

由於具有投資者身分的台商，尤其是屬製造業的大廠，大多沒有長駐中國大陸的投資地，因此本文選擇台籍經理人員作為研究對象，

張家港於 2001 年、長熟於 2003 年、太倉於 2004 年獨立成立台商協會或台資企業協會（參考中山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網站）。

14 嚴格而言，每個地區的台商協會或台胞投資協會會員數，並不等同當地實際的台商企業數，以及在該地工作的台灣人數，例如，據深圳台商協會統計，深圳地區加入台商協會為 2,000 家，實際該地台資企業約有 4,000 家，協會估計當地長住的台灣居民則逾 5 萬人。但由於目前台灣及中國大陸官方統計，都無法提供各地確切的台籍工作者人數，並且，從中國大陸各地已普遍成立台商協會組織，擴及有 100 個城市之多，故以加入台商協會會員數及其增減情形，仍是目前推估實際台商企業數，及該地長住工作台灣人口「變化」的一種較可行方式。

分析他們到達大上海的工作地後，如何進行移居生活。本文的資料來源主要是作者 2006 至 2008 年期間每年八月份暑期前往大上海，包括上海市、蘇州、吳江及昆山地區，進行的田野研究訪談及觀察。研究主要透過滾雪球的抽樣策略尋找受訪對象，但過程中，同時有意識地考慮到受訪者進駐工作地的時間、工作地點、性別、年齡層、婚姻狀況、受雇屬性等因素，盡可能使受訪對象的樣本選取多樣化。因為研究對象是針對長駐的台籍經理人員，故所有訪談都在大上海地區進行，地點選擇在受訪者的公司、工作地鄰近的餐廳，或是受訪者的居住地／宿舍。在上述地點訪談時，研究者還同時留意觀察其空間的擺設（如是否訂閱台灣的報紙、雜誌，裝置衛星接收器等），並且利用幾次假日的非訪談時間，親近受訪者，實際觀察移居者的移居生活情形。不過，僅與部份受訪者尚稱短暫且有限層面的相處，並無法提供台籍工作者移居生活的全面性，所以訪談問題與觀察重點，皆側重台籍經理人員在移居生活中，是否存在跨兩岸的聯繫，以及，在哪些部份，如何進行跨地域的聯繫？此外，研究雖然有注意到受訪對象的不同年齡層，但受限於樣本數，以及目前台籍經理人員移居上海普遍時間仍短，故無法針對不同世代移居生活情形進行比較，同樣的，不同族群與工作行業別對移居生活究竟起了如何的影響，受限於篇幅，也無法在本文中詳細處理。

作者透過簡要的訪談大綱，搭配敘事性訪談(narrative interview)的方式(Flick 2002)，共取得 56 份的訪談資料；其中 52 份為台籍經理人員訪談，4 份為台籍人員配偶的訪談。¹⁵

本文所指涉的台籍經理人員，主要包含三種類型：(1)被視為具有台商身分，屬公司派駐大陸子公司的最高階台籍主管，有實際經營的權責（屬性為 i）；以及(2)受雇於台商公司，常駐中國大陸的台籍幹部（屬性為 ii）；或是(3)受雇於外商公司的台籍專業經理人員（屬性

15 受訪的 4 位台籍經理人員配偶，其中 1 位為台籍，3 位為中國大陸籍，皆為女性；受訪時年齡介於 28 至 31 歲；教育程度部份，除 1 位沒告知外，有 2 位為大專程度，另 1 位為博士。

為iii)。三類人數依序為11、37及4位，各占樣本數之21.2%、71.2%及7.7%（參見表二）。

受訪者工作地／移居地，屬上海市有27位，吳江地區3位、昆山地區4位、蘇州地區18位。受訪的台籍經理人員，男性有40位、女性12位，女性占23.1%；¹⁶年紀介於27與57歲之間，尤其以30及40歲的年齡層為主，其中，30歲年齡層占38.5%，40歲年齡層則占42.3%，二者相加達八成的比例。此外，受訪成員中，有超過四分之三具有大專以上的教育程度（參見表二）。顯示，這群在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女性比例不低，近樣本數四分之一，且分佈在年輕及中壯為主的年齡層，及高教育程度的特性。這些特徵，與研究者長時間在華南地區接觸曾經歷「黑手變頭家」的台商群體相較，都具有非常明顯的區別。

訪談取得的所有口語資料，都透過轉譯(transcription)的程序，予以文字化處理。同時，為了彌補訪談資料可能的不足，訪談事後也都撰寫田野筆記，記錄田野觀察，作為資料分析的另一來源。

由於一般認定下，台籍經理人員選擇跨界，心態上是暫時性停留或長期居留，會相當程度地影響移居生活的安排，且在訪談的大綱中，研究者曾詢問受訪台籍人員當初跨境遷徙時，「視在大陸工作為暫時的，或永久的人生計畫」。因此，本文首先針對每筆訪談資料，就有關遷徙動機面向進行評析，並就個案表達為暫時性的，或永久性的／長期居留傾向，進行分類。

此外，訪談過程中也詢問：「來大陸工作後，是否等同於長期性的移民」，所以資料評析根據此部份的回答，以及其表達在遷徙過程中，體現為暫時性停留（沒有攜帶配偶、小孩，也沒有在移居地購房），或長期居留傾向（攜帶配偶、小孩前往，或／及在移居地購房等），進行資料另一面向的分類（參見表三）。

16 在跨界工作的台籍工作者中，女性的比例相較男性為低，背後有結構性因素限制影響女性的工作跨界，請參見鄧建邦(2008b)。

表二 受訪台籍經理人員基本資料特徵(N=52)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受雇類型屬性		
i	11	21.2
ii	37	71.2
iii	4	7.7
主要工作地 / 移居地		
上海市	27	51.9
蘇州	18	34.6
吳江	3	5.8
昆山	4	7.7
性別		
男性	40	76.9
女性	12	23.1
年齡層		
20-29	4	7.7
30-39	20	38.5
40-49	22	42.3
50-59	6	11.5
教育程度		
高中 / 高職 / 專科及以下	12	23.1
大專及以上	39	75.0
未提供	1	1.9

就本文而言，研究的每一份資料，除了是一筆敘事性訪談的結果外，它所呈現的同時也是一部個人的遷徙傳記(migration biography)。Ursula Apitzsch (2003: 65)就指出，如果針對移民透過移動所建構的空間分析，不局限於地理性的空間，而包含經由遷徙所建立的「關係上的社會空間」，則顯然移民傳記本身，就是具體化此社會空間的所在。因此以下分析敘述的重點，首先透過挑選可以代表類型意義的典型個案，觀察遷徙過程與個人生命歷程的關聯，以及個人運用怎樣的策略，進行在移居地 / 工作地的生活。接下來，透過類型分析呈現不同遷徙樣態之間的差異性，進而分析不同類型間彼此可能的共同意義。不過，研究中沒有發現在移居動機上設定為長期居留，但移居過程卻呈現只是暫時性停留的案例，故沒有表三類型 IV 的分析。

表三 移居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遷徙型態

遷徙動機	遷徙過程	
	長期居留	暫時性停留
長期居留	I	IV*
暫時性停留	III	II

* 本文的田野中沒有發現屬於此型態的個案。

（二）典型案例分析：

1. 類型 I：安美夫妻

安美先生（36歲）於2001年4月來到上海；安美太太（33歲）晚了兩年，¹⁷2003年辭掉在台灣的工作後，才來到上海，當時她還是未婚的身分。2005年，兩人一起回台灣辦理結婚，接受訪談時他們還沒有小孩，屬於典型移居上海的年輕台灣夫妻家庭。目前，安美先生名片上印製的是一家餐具製造商的銷售經理，實際上是該公司的中國區代表。

上海，嚴格來說，並不是安美先生接觸的第一個中國城市。因為祖籍在安徽的關係，1992年隨父親回老家探親，那是他的第一次中國經驗。之後，他每年都固定去大陸一趟，除了拜訪安徽老家親戚，同時順道旅遊。由於中國經驗豐富，所以當有同行業的台灣公司想投資上海，尋覓可主持投資計畫的專業經理人時，安美先生就毅然地答應，並於2001年來到上海。開始長駐上海工作時，他把個人名下在台灣「所有的產業、房子，通通都賣了」，為的是顯示自己的決心，打算就要永遠在此尋求發展。

訪問時，安美先生的現職，已經是他在上海的第三份工作，之前經歷了一家台資及一家美商公司。但在三個公司的工作內容都一樣，都是替外資廠商負責上海設立據點的前置作業，包括主持投資、進行未來市場規劃，是一個專業經理人。他所形容的上海印象，九年初期是「穿藍衣服、灰衣服，大家都死氣沉沉的」，但2001年開始長

17 本文有關受訪者的姓名、經營／服務的公司，或是在訪談中提及的廠商名稱，皆進行匿名化處理。

駐後，覺得「整個上海的氣氛變不一樣，積極度變得很強」，大家耳熟能詳的上海建築地標物東方明珠塔、¹⁸ 浦東新區的開發，他用很堅定的語氣說，都是近十幾年的事。

為了在地化與生意工作上方便，安美先生結識了許多本地的朋友，甚至「應該本地的朋友比台灣的朋友還要多」。他在上海的台灣朋友，大多是之前在台灣早就熟識的，因為來這裡「大家等於都離鄉背井嘛」，所以逢年過節常在家裡煮飯，請「單身在上海」的台灣朋友到家裡聚餐。他也強調，來上海五年從沒考慮家裡裝小耳朵，收看台灣衛星節目；「百分之百看本地電視」，強迫自己吸收裡面的知識，才能融入這裡，為此，安美太太早期還不時抗議。倒是，來自台灣的商業周刊、天下雜誌、Cheers 及一份 EMBA 雜誌，是他訂閱且每週必讀。相對於自己生活上的在地化程度，他認為在大陸的許多台商工廠並不是如此，尤其是那些大型資訊科技廠，他表示：

我之前去松江（區），那個泛達，他們設廠，整個宿舍裡都是台灣人，來來去去都是台灣人。……這些台商來這裡蓋工廠，我每次都跟他們開玩笑，你們這不叫設廠，是造鎮。幾乎是整個造鎮！半導體廠，像蘇州的華大、亮基、松江的泛達，整個廠區裡頭什麼都有，該有的（生活）機能，都在這裡。所以真要講的話，這樣子的台商並不叫移民，它只是轉移一個跟台灣完全一模一樣的生活環境。……對啊，那就是另外一個 *Taiwantown* 而已，就像當時日本遷村去荷蘭一樣，那種感覺。（訪談編號 T022, 2006）

安美先生不只一次的強調，在上海這個超競爭的國際都會要生存，首要一項就是不刻意凸顯自己台灣人的身分。不管在台商、外商

18 上海東方明珠塔位於黃浦江畔，落成於 1994 年，象徵上海城市躍升成為東方的一顆明珠。

或是本地的公司，「都不該因為是台灣人，而覺得這是你的競爭力」。這點，安美太太不完全同意，她說「通常在外，我不喜歡讓人家知道我是台灣人，但某些時候，我卻會讓人家知道我是台灣人」，比如：

我自己在這邊辦過證件，我台灣的護照，比本地的身分證好用，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當我去澳大利亞領事館的時候，一開始的待遇是很不好的，像二等公民，「資料填好了沒？」，然後，問問題，「不准問問題！」，就是這樣子。後來他看到我（資料）上面有台胞證，跟台灣護照，「妳是台灣人？」，我說，「對！我想辦護照（簽證）」。「資料給我看！」看一看，「妳這好像不能在這裡辦，我們只能接受團體的」，態度馬上不一樣。我說不好意思，因為沒辦法回台灣辦，但我要跟台灣的（旅行）團，全部的資料我詢問過很多次，都在裡面。看一看，「好！」，就跟我說，約什麼時候面試，資料就收了。可你知道嗎？本地人在外面排多久、等多久、來了幾次，有的從蘇州來的，一樣東西不對，根本不管，退件，真的是退件，然後他一看到我老公說，「你們收入還滿高的嘛」！

[他怎麼知道？]

因為要附薪資證明、繳稅證明。他沒看到薪水，但他光看到我們繳給中國人民政府的錢……，他就知道，你們是不一樣的。（訪談編號 T023, 2006）

對安美太太來說，除了台灣人的身分，上海的台灣人也對她生活起很大影響。雖然生活中接觸的本地人很多，但卻無法解決生活中碰到的種種問題，尤其是初期的新環境適應，因為「他們所告訴我的地方落差都很大，我永遠買不到我認知裡的東西」。之後，她透過報名一個英文課程，認識了兩位台灣太太，生活開始有了很大的轉變，

「我什麼問題都問她們。原來菜要去哪裡買，原來我要什麼東西，要去哪裡買，喔原來還有什麼東西」。

所以安美太太之後又去參加插花社、瑜珈課程，雖然認識的多是稍年長的台商太太，但只要有活動她都樂意參加，透過這個方式，「在這個地方，會有我的人脈」，「像我們去插花，大部分是在交流」。這些交流，包括如何取得許多被大陸網站封鎖的台灣資訊、在地的美食經、甚至是先生婚外情的對策等。

上海，愈來愈是安美夫妻的家，卻不是因為他們買房入戶了。安美太太說他們住的房子，一直是用租的，「公司租到哪裡，我們就住到哪裡」。其實，安美夫妻確實曾在上海買房子，而且還買了兩次，「我在古北買過兩間房子，後來我又賣掉了，因為價錢還不錯，而且已經開始跌價了，就把它賣了」。安美先生認為，衡量上海買房，「投資的角度，要比因長住所以買房，來的大些」。

安美太太並不認為買了房子才是家，透過他們這幾年細心的營造，「覺得這裡比較像家，回台灣是回我公公婆婆的家」。他們現在回台灣，總是回去時東西儘量少，然後回上海時行李超重；她慶幸先生工作地是在上海，生活機能方便，出門吃本地的東西，回到家裡可以「做習慣的菜餡」、「用自己的方式來吃」。

是不是要長住上海？安美先生說，「如果有人一個月拿很高的月薪，來請我去美國，哪怕去南非工作，我也去。像我們這樣心態的人應該很多吧？！」。對安美太太來說，先生工作地點的改變，對家庭生活的安排，具有絕對的影響，「來到上海，現在或許覺得它是我們的家，可是未來真的有機會到美國，或到哪裡，只要有更好的工作機會，我們還是會過去；因為就算留在上海，他到了第三地工作，存在的問題還是跟兩岸三地一樣」。對安美夫妻而言，既然之前選擇讓一方放棄原本穩定的工作，以移居家庭型態來面對流動生活，就沒有理由往下一個流動的停靠點時，改變目前的生活策略。但是他們會協力經營每一停靠點，讓它有家的感覺。是否有繼續移動的可能性，目前選項是完全開放的。

2. 類型 II：蘇州精密科技謝廠長

謝廠長（38歲）任職的精密科技廠，座落在吳江市的吳江經濟開發區，右方緊鄰與周庄齊名的同里風景區，以及同樣是台商公司集中度相當高，有小台北之稱的昆山市；開發區的上方則與蘇州市緊緊相連，經由蘇滬高速公路的連接，不到一小時車程，可以到達另一個台商及來自世界各地科技廠商雲集的蘇州工業園區。

蘇州精密科技目前有員工九百多位，搭配九位台籍幹部，母廠仍在台灣高雄，此外還有另一生產基地遠在海外的馬來西亞。謝廠長的馬來西亞籍太太，即他在1995年任職另一家台灣大型光電公司，派駐馬來西亞時所結識的。外派兩年後，具有管理專長的謝廠長，1997年回到台灣，緊接著於1998年底，選擇加入精密科技，並隨著公司展開在長三角地區的佈局，前往吳江。他在調派大陸一年後結婚；太太跟隨移居，目前擔任同一公司的採購長，育有一位兩歲的小孩。

謝廠長與安美先生同樣年輕，也擁有豐富的工作生涯經歷，但在個人移居的動機上很不一樣，「只因為工作地在這而已」、「我是一個不排斥到大陸工作，但是要在大陸定居，是我不願意的」。他解釋自己來到吳江，只是因為工作的因素，在這邊的居住是暫時性的。

謝廠長認為市場在大陸，所以來這裡工作，他也相當認同蘇州吳江這個地方的工作環境。在他看來，許多南方台商較集中的區域，城市中的設施、生活機能，主要是隨外資投入、大量工廠進駐才建立的，形成的環境「就是一個大工廠」；相對而言蘇州長三角地區，本來即是一個很健全的大環境，擁有歷史古城、園林，即使台商不進駐，蘇州本地人構成的生活圈，也自成一格，各式各樣的生活設施一應俱全，「我們進來只是個外來客，用他們現成的大環境，增加一些外在的設施」。

在謝廠長的生活中，由於工作主責的是工廠管理，工作時間接觸的多是大陸籍及台籍幹部，下班之後也很少交際應酬，生活圈就是以台幹為主，並沒有加入本地的社團。倒是廠方提供的眷屬宿舍，裝置有一個中耳朵，可以隨時收看台灣衛星電視節目，雖生活在外，卻很

關心台灣發生的大小事，「有電視看，你就不會跟台灣脫節」；每天晚餐時間，一起觀看八點檔連續劇，也是他們夫妻晚上的共同休閒，而且回到台灣家裡時，「還可以跟爸媽接起來一起看」。他們每兩個月輪休一次，回台灣一週；因為觀賞同樣的連續劇節目，讓他們跟父母親雖相隔遠距，但茶餘飯後始終有話題。

儘管老婆小孩都在身邊，而且已經長駐當地工作了八年，謝廠長還是認為在目前居住地並沒有家的感覺，「很像是宿舍」。住在眷屬宿舍，或許是主要因素。那為什麼不就近在廠區附近，購置一套理想的住房呢？謝廠長說：

為什麼不敢買房子？可能你剛買，沒多久就把你調回去，不管你做的好不好——可能做好老闆升遷你，也可能做不好進行職務調配。你永遠不知道老闆下一步會做什麼事！這樣的情況下買房子，怎麼會安心呢？像我同學在華大負責行銷，現在掛副總，也是一樣的情形。2001年到上海，第二年他攜家帶眷全都過來，起先租房子，但與其租房子這麼多錢，而且可能會長駐，市場又這麼大，乾脆買房子；買了400多萬（人民幣），很豪華，而且裝潢還考慮乾燥，地板都使用地熱，打算長期定居；弄好交屋了，住不到半年，老闆要他去美國，又能怎麼樣？（訪談編號 T020, 2006）

對謝廠長來說，沒有買房是考慮到個人無法完全掌控職務的調動，而且要購置一套理想住房，以目前大上海地區房價節節攀升的情形，也不是輕易負擔得起的。還有一項因素是，他在訪談過程中不斷重複的，只是把目前在蘇州吳江居住地的停留，視為是工作需要的停留。他認為在大陸工作，「壓力是台灣的兩倍」。工廠中的許多機器設備是24小時運轉，雖然人員有休息，但只要工廠持續運作，相關人員都須維持待命的狀態。所以儘管市場在這，但個人可以持續承擔異常的工作壓力，畢竟有其年限，因此他一直認定結束這裡的工作

後，就要回台灣；或者也不排除去馬來西亞，因為那裡的生活步調，讓他覺得舒適。

3. 類型 III：上海協富科技趙經理

協富科技位在上海市松江區的松江工業區，除了上海廠外尚有蘇州廠及東莞廠。協富科技在大上海地區就有兩個生產製造基地，主因是上海廠屬鄰近台灣資訊科技大廠泛達的協力廠商。雖然協富科技地理位置落在上海市，但從工廠到上海市中心，或是經由外環道路銜接滬寧高速公路到昆山、蘇州的時間，其實相距不大，皆需近一小時的車程。

趙經理（33 歲）第一次接受訪談時，¹⁹ 到大陸工作已經接近三年；之前在協富科技的台灣公司任職兩年後，於 2003 年 10 月份調派中國大陸。他到大陸的第一站並不是上海，而是同屬協富科技公司的東莞長安廠，2005 年 7 月才從東莞派駐來到上海。剛到大陸工作時趙經理還是單身，目前已經結婚；妻子是河南省籍，在東莞時期認識的同廠員工，目前尚未有子女。

不同於公司中其他短期性支援的台籍幹部，趙經理是一到大陸工作就是長駐；在上海廠目前約五百位員工中，屬於長駐型的，還有另外六位台籍幹部。雖然趙經理當初移居大陸，考量的與謝廠長一樣，主因都只是單純地認為個人在台灣整體就業環境的機會，比不上在大陸來得大，所以才選擇遷徙，但長駐大陸工作，又娶了大陸本地的女孩；理所當然考慮留下來，永久在大陸發展了。

趙經理所看到的上海、大陸經濟的發展非常快速，最明顯直接的感覺是車子變多了；即使在長安，以前是貨車滿街跑，現在大馬路望眼過去，都是私家轎車。他與太太住在公司提供的套房式宿舍，雖然公司也為員工宿舍裝設小耳朵，可以收看衛星電視，但是他認為台灣

19 和趙經理的訪談，第一次於 2006 年 8 月間在上海進行；2007 年研究者前往上海進行另一主題研究，嘗試與趙經理連絡時，上海公司告知已離職，幾經輾轉連絡，得知趙經理已經前往東莞長安另覓工作，而同一公司也曾接受研究者訪談的一位副總，則是離職後前往武漢工作。關於趙經理離開上海工作地的資料，來自於研究者於 2007 年前往東莞長安與趙經理進行的二次訪談。

新聞性的節目「整天吵吵鬧鬧」，沒有好感，對閱讀當地的報紙也不感興趣，只留意台灣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

離開台灣的時間愈長，趙經理明顯感受到，愈難維繫著像以前一樣的關係。不過，他也補充說，相對的是在移居地的朋友愈來愈多，不管是之前工作的長安，或是訪談時的上海；因為是主責業務部門，公司又是台商的協力廠，所以他結識很多的台灣廠商朋友及台籍幹部。這些台灣廠商朋友及台籍幹部，平時就是生活圈的主要夥伴；而休假回台時，聯絡的對象也是回到台灣的熟識台商及台幹。

在上海訪談趙經理時，他提到協富科技上海廠人員流動率不高，「我的部門已經很久沒有人流動了」。不過就在研究者於2007年8月在上海打算再次造訪時，他卻已經離開協富科技廠了。據趙經理陳述，2006年底協富科技上海廠加入一位新股東並兼總經理職務，進行了人事的「內部調動」；同年11月，他從上海調回東莞的長安廠，2007年3月辭掉在協富科技的工作，轉而申請到東莞長安的另一家擁有一千多位員工、十多位台籍幹部的塑膠科技大廠，並於8月到職，掛的是副理的頭銜。太太也跟隨他，從上海移居東莞。這個過程讓他清楚一項事實，有工作是最重要的，而且工作是現實的，不是自己可以完全決定工作地及居住地的：「假如我想住昆山好了，那在這裡上班，我能實現嗎？一樣不行」。

趙經理目前並沒有購房的打算，雖然認為昆山確實是個不錯的環境，既沒有上海市區的擁擠，又有「像竹科這樣」的都市規劃，比目前工作的長安城更適合居住。但是他希望可以「保持最大的彈性」，不要為了房子綁在某個地方。另一方面，對他們夫妻倆而言，買房「也還沒那麼急迫，因為我們台灣就有房子」。在工作環境迅速變化時，他們希望維繫一個在工作地的「工廠的家」，以及另一個相對不會變動的「台灣的家」。對於未來規劃、打算在哪裡定居，趙經理直覺的回應是，看工作在哪裡而定，「那時候我都回台灣了，也說不定」，「像我去年根本沒想到，我會回來這裡」。

(三) 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三種遷徙型態意涵

上述三個傳記敘述的重建個案，可以分別代表台籍經理人員跨界流動前往大上海地區的三種不同遷徙模式。

表四 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遷徙類型及特徵(N=52)

特徵	單位：個案數（百分比）			
	類型			小計
	類型 I 長居 上海型	類型 II 工作 停留型	類型 III 跨界 聯姻型	
受雇型態				
派駐大陸子公司的最高階台籍主管	2	8	1	11 (21.2)
常駐中國大陸的台籍幹部	6	17	14	37 (71.1)
外商公司的台籍專業經理人員	1	2	1	4 (7.7)
移居大上海時間				
5 年(含)以上	2	7	10	19 (36.4)
3 年(含)至 5 年	4	3	3	10 (19.3)
3 年以下	3	17	3	23 (44.3)
回台頻率				
每年 6 次(含)以上	0	14	4	18 (34.6)
每年 2 次(含)至 6 次	7	13	12	32 (61.6)
每年 2 次以下	2	0	0	2 (3.8)
配偶 / 家人移居上海情形				
配偶 / 家人一同移居大上海	7	2	15	24 (46.2)
配偶 / 家人沒有移居大上海	2	25	1	28 (53.8)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研究訪談資料整理而成。

類型 I：長居上海型

屬於類型 I 的個案為不管就遷徙動機，或是在遷徙過程中，都打算長期居留於大上海。如同安美夫妻，或同類型中前往蘇州工作不到三年的黃副總，目前都已安排太太、小孩在當地生活與唸書，以及在蘇州某光電公司的廖總、上海松江區光電大廠的陳處長等個案，他們看到的是中國的無窮市場潛力、豐富的機會，及對上海的全球城市想像，認定上海生活環境要明顯優於華南地區其他台商聚集的都會，所以儘管有些個案到移居地時間並不長，但都已舉家搬遷，計畫長期定居在大上海。

類型 II：工作停留型

與類型 I 恰好呈現對比的，是類型 II：屬於無論在最初的遷徙動機，或是遷徙過程，皆視在移居地的停留，主要為了工作，而非有計畫性地長期定居。如蘇州吳江謝廠長的情形，或是在蘇州光電廠的葉副理，以及同一科學園區另一光電大廠負責品保部門的陳副理、財務部門的女性李副理與人事部門的陳處長等。儘管受雇台商公司中的台籍幹部分屬三個類型，但如表四所示，以落入類型 II 的個案數為多；相對上，落入類型 I 則明顯為少。一個解釋是，最高階台籍主管或任職外商之主管，相較居於台商公司中的二階或灰領層級的台籍幹部，在工作上擁有較高的自主權限，所以更可以決定移居生活如何安排。而一般台籍經理人員，基於職務可能頻繁調動的考量，所以如典型案例描述的情形，雖然金錢能力沒問題，但對是否在當地購房作為住家長居，表現出猶豫不定的情形。此外，落入類型 II 中，有多位單身的女性台籍工作者（包括任職外商公司或台資企業），例如 IBM 上海部門的黃專員、在一外商跨國公司從事貿易諮詢的紀姓專員，及在上海一台灣貿易公司主責採購的江姓副理等。而如果再考量移居大上海的時間，更可以看出落入類型 II 的個案，有較多屬「移居上海時間短」（移居時間 3 年以下）情形，可能在工作簽約期滿後，即選擇不再停留於移居地。

類型 III：跨界聯姻型

另外一種遷徙模式類型 III，與前述二種模式都有部份相同，但同時也有差異：在遷徙動機上認定是暫時性的，但在遷徙過程中，表現為傾向長期居留的型式。如同上海協富科技趙經理個案呈現的，類型 III 的遷徙動機，與類型 II 一致，都視移居大上海地區純粹肇因工作因素，而不是永久的人生計畫；但就遷徙過程來看，又表現與類型 I 類似，傾向長期居留中國大陸。之所以有此轉變，一個主要原因，是即使初期只是因緣際會外派大上海地區，或主動前往尋找工作機會，但過程中與中國大陸籍女性／男性結縭，於是更積極地考慮留在當地，

尋求發展。

雖然在遷徙模式上，本文訪問的大上海地區台籍經理人員呈現出上述不同樣態，遷徙時間也長短不一，但在日常生活的諸多面向上，卻具有許多移居成員共同分享的特質。一個明顯的例證如表四所示，儘管屬類型 I 長居上海型個案的回台頻率，相較其他兩類型明顯為低，但幾乎所有台籍經理都是每隔一段時間即會返台，僅有一位台籍經理在訪談時指出，由於工作關係過去一整年都沒回台。此外，屬回台頻率低（每年 2 次以下）有兩位，但每年來回兩岸達 6 次及以上者，卻高達 18 位之多，占訪談個案三分之一強。亦即，前往大上海工作的台籍移居者多數皆有定期回台的經驗，且訪談個案中有超過三成以上的台籍經理，以平均不到兩個月時間，在生活上頻繁地往返大上海與台灣之間。

在研究訪談期間，兩岸常態包機尚未全面實施，來往大上海與台灣所需時間及金錢花費要更大。一位屬類型 II 外派上海松江區已兩年，公司從事生產冷卻設備的賴總經理即指出，他平均每兩個月休假回台一次，休假時一大早五點半出門，搭從上海起飛最早的八點航班，最快下午三點半才抵達桃園機場，「等於需一整天的時間成本」，才能從移居地上海，回到移出地的台北。

五、移居生活中的多重地域連結

上述類型分析指出，儘管台籍經理人員的跨界呈現三種不同的遷徙型態，有些設定為長居大上海，有些卻認定只是因工作關係而移居當地，有些因工作嫁娶當地大陸籍人士轉而計畫長期停留，但這群台籍經理人員都有一個共同特徵：週期性及頻繁地往返移居地與移出地。

然而，對前往大上海的台籍專業工作者，他們的特徵除了表現在頻繁地來回跨越邊境的物理移動外，在生活上更是如跨國主義學者 Faist (2000a: 13) 指出，透過在物品、金錢、象徵、觀念及文化行為的

循環，進行跨界的連結。以下即從這些面向，進一步分析上述三個遷徙類型移居者的日常生活。

（一）物品

在本文研究的案例中，不管是長居型（類型I）、工作停留型（類型II），或是跨界聯姻型（類型III），多數移居者除了日常生活在移居當地消費外，都如安美太太敘述般，經常性地回台灣原居住地消費，進行各式各樣採購。移居地住家抽屜滿滿來自台灣的日常藥品、衣物、食材、零嘴，甚至是個人偏好的貼身用品，只要比移居地價格較便宜或不易取得的，都可能成為移居者回移居地時的攜帶必需品。相對的，有些物品也會透過移居者從移居地帶回原生活地台灣。比如，研究者在台灣曾接觸屬類型II的短暫回台休假台籍工作者，不僅攜帶大量香煙回台，談話時也是「中南海香煙」不離手，他表示因為台灣香煙當地不易取得，每日需求量又高，只好改變香煙品牌。

（二）金錢

許多關於藍領的跨國移工研究指出，匯款(remittance)是與家鄉保持聯繫的重要方式(Pries 2001; Phizacklea 2003)。台籍工作者雖然一般提及沒有匯款回鄉的壓力，但台資廠中的台籍經理人員維持兩份薪資，一份薪資在大陸支領，一份薪資匯回台灣，也是常見情形。就如一位屬類型II在蘇州光電廠任職的鄭副總指出，公司中聘任的台幹也必須在大陸繳交所得稅，而台籍人員的高所得往往須繳交高額稅金，所以公司讓台籍員工在工作地支領派駐津貼（4,500至5,500元人民幣不等），作為當地生活費用，其餘薪資則匯回在台帳戶。而分屬不同類型在外商公司任職的台籍經理，儘管薪資都在移居地支領，也全數在當地報稅，但多也維持定期匯款給在台的其他家庭成員。

（三）象徵

在象徵的面向上，最明顯的例子是有關台灣人身分的凸顯。如屬

於類型 II 的個案，由於遷徙動機與過程都定位在暫時性停留，所以在移居生活中並沒有刻意在地化，而多以台灣人身分自居，儘管對於目前的工作環境相當認同，也已移居多年，但卻一直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很少參與地方性活動，也沒有（打算）加入當地的社團組織；台灣人的身分，對這群移居群體而言，在移居地象徵的是外來客身分的社會位置。

相對的，所有類型中最企求在地化的當屬類型 I，不管就動機或過程都打算長居。但他們的生活行為就如安美夫妻般，平時不會刻意凸顯台灣人身分，但若是表露身分可以獲得較佳對待，或是得以避免偏差待遇時，他們也會不吝於讓對方知道自己的身分。如同，Goldring (1999)指出的，起源位置(the place of origin)對個人在移居地的生活仍是重要的。在適當時候，彰顯移居者的源出身分，反倒可能強化他們在移居地的社會位置。

（四）觀念

移居大上海的日常生活，有多數台籍經理都指出他們平常的資訊管道，如上網、雜誌、報紙，都既是大陸又是台灣。如屬類型 II 的上海某一貿易公司的林總，他雖然一再強調從來沒有定居上海的打算，既無購房、家人也沒有跟隨移居，但訪談時我們約在他公司旁的一家連鎖咖啡館，一進門就可看到架上排滿整齊的報刊，一半當地報紙，一半來自台灣空運的報刊，林總說「我天天來這邊吃早餐」。他天天看上海的晨報，也看台灣的報紙、天下雜誌等。大陸中央電視台每日半小時的台灣新聞，也是他的每日功課之一。大上海地區由台灣人經營的類似連鎖咖啡廳，或是許多台商公司的待客大廳，也很容易見到相似的報刊陳列方式；這多少反映出移居當地台籍工作者的資訊需求習慣。

而在住家拜訪台籍移居者，也發現他們不只觀看當地節目，還時常透過衛星接受器收看台灣節目，有一次在屬類型 III 跨界聯姻型的受訪家庭中訪談，也是一進門就見大夥都專注在播映中的 TVBS 節

目。衛星電視即時傳送的節目，提供這些跨越疆界的家庭，可以遠距、且同步地分享相同的資訊及文化價值。換句話說，這些移居者不僅觀念與價值深受移居地與移出地的影響，且移出地的資訊拜當代科技之賜，得以快速、甚至同步地進入移居者的日常生活中。

（五）文化行為

在文化行為上，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飲食方式。不管是類型 I 長居上海型，或類型 II 工作停留型的移居者都認同，上海生活機能非常方便，所以出門吃當地的東西，但回到家裡，就如同安美夫妻個案，也不放棄「做習慣的菜餚」、「用自己的方式來吃」。他們一方面對大上海地區當地的美食如數家珍，卻也不忘台灣的口味。

（六）橫跨地域的社會網絡

大上海台籍經理的移居生活所進行的跨界連結，除了 Faist 上述提及有關物質性及社會性資源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Helen Krumme (2004: 148) 指出的橫跨地域的社會網絡。不管是類型 I 典型個案所呈現的，把移居地當作是「自己主要的住家」，回台灣是「公公婆婆的家」，或是類型 III 案例的敘述，把移居地公司宿舍當作是相對於「台灣的家」之外的「工廠的家」，其實都指出台籍工作者在移居地生活一段時間後，都會進行家的重新定義(redefining home) (Butcher 2006)。早期描述移居者從移出地到移居地遷徙的圖像，如同 Alfred Schutz (1944) 所描述的，是從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轉換到另一個社會結構的過程，而移居者為了成功地克服在新社會面對的種種問題，唯一的手段即是採納新文化模式，轉換自己的認知關聯架構(scheme of reference) 趨向於新社會，以整合成為本地人。所以整個移居生活，象徵的是一除根的過程。但從到上海工作而移居的台籍經理人員來看，雖然在地化是不少移居者企圖達成的，但即便如此，他們的移居行為中既沒有真正切斷與移出的台灣社會的聯繫，也大多沒有強迫自己放棄原有的認知關聯架構，整合為本地（上海）人的打算。

他們在跨界的期間，雖然是長時間生活在遷移地社會，但並沒有呈現除根現象。對這些台籍工作者而言，家是可以橫跨兩個地域空間存在的；把家從單一定點，延伸為具有跨越邊界的空間與社會關聯。

儘管前往大上海的台籍工作者，分屬於上述三種不同遷徙類型：長居上海型、工作停留型及跨界聯姻型，且在地化的程度不同，移居時間有長有短，但定期在移出與移居地往返移動，物質性面向上的兩地消費採購行為、定期金錢匯款，以及社會性面向上的適時凸顯起源位置、雙地域的觀念／價值、結合兩地的吃食文化慣行，與跨地域社會網絡等，都表現出具有多重地域連結的傾向。

也就是說，前往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不只是從一地到另一地的跨越邊界移動的人群而已，在遷徙過程中還重新組合了移出地與移居地脈絡的元素，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元素的意義，重點當然不只是兩地脈絡的相加而已；對遷徙的專業工作者來說，它更在於提供一種穩定的生活型態，如 Robert C. Smith (2001) 指出的，是跨界生活(transnational lives)的型態。

這種跨界生活的型態，並不同於離散群體的跨界連結。第一，離散群體通常對家有強烈的想往(desiring home)，把家鄉視為個人最終的回歸處所，儘管想像中的家鄉可能已不復得(yearn to return to their lost homeland) (Faist 2000b: 197; Mayer 2005: 9)，如同張茂桂(2006)指出大陳島居民遷台後仍強烈想望失去的家園。相較之下，台籍工作者經常性地跨界移動，在移居地也經常透過MSN、每日的家人電話、甚至是網路視訊等，²⁰ 持續地與原移出地家園保持連結，少見如離散群體表達出「失去」、「不復得」家園的心情。

第二，離散群體與移出地的聯繫，較常是以「想像的」、「記憶的」方式呈現，如 Faist (2000b: 197) 指出，離散群體並不必然需要「具體的社會聯繫(concrete social ties)。但對於台籍經理人員而言，上述表

20 比如移居蘇州工作將近三年，於一家台資光電廠任職品保部的葉副理就指出，他幾乎每日都打電話跟家裡及在台女友聯繫，每月光是電話的通訊費，就要七、八百元人民幣。這樣頻繁的兩地聯繫，在田野接觸的其他受訪個案中，也相當常見。

現在人員移動、物品、金錢、象徵、觀念、文化行為等循環，卻是有形且實質的聯繫；跨社會的聯繫提供了各項物質性與社會性資源，有助於移居者解決移居生活中的種種問題。因此，第三，相較於 Stephen Castles 與 Mark J. Miller (2003[1993]: 30)指出，離散群體有較強烈的情感性面向(strong emotional connotations)，前往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經營跨界的生活，則有更多理性考量成份。

然而，為何跨界的專業工作者需要經營跨界生活？對移居的台籍經理人員而言，之所以需要往返性的跨界移動，進行跨界生活的必要性，一個重要因素，乃在於移居者在經營移居生活時，不僅希望可以運用移居地的在地社會資源與物質資源，也希望可以持續地保有移出地的社會與物質資源。正如 Karen Fog Olwig 與 Ninna Nyberg Sørensen (2002)指出的，當代流動人群進行移居／移民，並不必然只是到它處開啟新生活，毋寧更是透過移居／移民尋找新機會，提升及多樣化生活的可能性，所以使得「移動」變得具有異常的重要性。同時，儘管跨界流動愈來愈容易，但民族國家的作用仍在，跨界專業工作者在遷移地，常游走在優勢的高收入群體與外來他者身分之間。所以在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維持多重連結、建構跨境的空間，尤其在有關象徵層次的身分凸顯上，其實與移居者在移居地的權力及社會身分有關。

另一方面，跨界的台籍經理人員，相較於一般的藍領移工，雖然具有經濟及文化資本上的優勢，更可以經常性地跨界移動，但是他們的跨界也不是完全自由移動的，而是工作愈是呈現高度流動、工作的不確定感愈強，也愈凸顯流動帶來的強制性（鄧建邦 2008a）。因此使得跨界的台籍專業工作者更需要進行多重地域連結，同時保持兩個社會的聯繫，以降低或對抗在跨界工作流動過程中隨時可能遭遇的風險。

六、結論

台商現象具有重要的社會學意義，除了它本身鑲嵌在資本主義發展，是伴隨全球資本流動過程的產物外，還有很重要的一個面向，即在於此資本流動同時所引發的台商／台籍經理人員群體的跨界流動，成為當代移民研究的一個核心議題(Tseng 2000)。

本文強調透過跨國主義的觀點，可以補充對專業遷徙的觀察向來僅限定在人才流動對移出國及接受國的影響，或是一味地將跨界專業工作者視為優勢的跨國階級，而忽略專業遷徙在微觀層次之移民生活面向。

對於作為專業工作者的台籍經理人員，兩岸文化的類似與親近，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他們偏好選擇到中國大陸，尤其是到擁有豐富人文歷史面向的大上海地區工作，但卻不能解答這群人在移居後，為什麼要進行頻繁的跨界移動。同樣的，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跨國／境工作機會，以及驅策遷徙者往全球城市集中的趨向，但僅以全球資本主義觀點，也不能幫助理解跨國／境後的個人，究竟是如何進行移居生活的。

本文研究的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長時間生活在移居地上海，許多甚至有相當多年的移居經驗，並且計畫長期定居。但不管是屬長居型、工作停留型，或是跨界聯姻型的遷徙模式，這些跨界的專業工作者並不是一到了移居地上海，就把它視為是絕對的定點，理所當然地在移居生活上開始一種不流動、固著的生活型態(*immobile livelihood*) (Stepputat 2002: 222)。此外，他們也沒有如同世界主義者一般，可以無所不在地跨界、四處為家。畢竟多數跨界的台籍經理人員是受雇於台商公司，台商受限於全球生產的位置向來有區域性集中的現象；至於受雇於外商的台籍工作者，也多是因為兼具專業與華語能力，才得以超越其他國籍專業人才，具有派駐中國大陸的相對優勢。所以，本文強調運用跨國主義的觀點，才能更適恰地觀察這群專業人

員「跨境」遷徙的特殊性。

以前往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為例，這些專業工作者跨界後的移居生活呈現的是頻繁地來回移居地與移出地之間，並且運用兩地的社會與物質資源，及跨地域的社會網絡建構，進行多重地域的連結。這樣的跨界生活型態，是行動者主動積極地同時編織移居地與移出地的連結，強調的是經由社會慣行、象徵體系與物質文化所建構的實質聯繫，而不是如離散群體側重於想像的、記憶的及情感性的單向家鄉連結。所以，這群跨界專業工作者，更適恰地說，是透過經常性地跨界進行他們獨特的跨境空間生活，而不是一群離家久遠，有家歸不得的離散群體。

在大上海地區的台籍工作者，由於存在這種經常性地跨界，使得不管是從上海的住家到台灣父母的家，或是從上海工作的家、工廠的家到台灣的住家，透過往返性移動，反而轉換了定點式的移居生活型態，串連出跨越政治疆界的社會空間。因此，「回家」也不同于早期移民（如果有的話）只是一次性的行為而已(Schutz 1976)，這群跨界後的台籍經理人員，表現在移居行為上的，其實更是「持續地回家」。

作為跨境遷徙者與進行跨界生活的必要性，說明了作為專業工作者的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一方面希望透過兩邊社會一些元素的重新組合，形塑有利於自己跨越邊界流動生活的條件外，另一方面，對這個群體而言，既然流動是日常生活中必須面對的一種常態，因此重要的是可以持續地維持遠距的跨社會的連繫，建構多重地域的參考架構，來面對流動不確定性的生活。換句話說，在上海熱潮持續不斷下，與其描述是一波波專業人才蜂擁移民上海（陳彬 2000），倒不如理解他們為了進行跨境遷徙，到大上海地區進行跨界的生活。透過編織多重連結所進行的跨界生活，不僅是跨界專業工作者為了尋求個人生涯更佳機會的方式，同時也可以理解為，是他們在進行流動生活過程中，延伸出一種求生存必要策略。

而有關世代、族群、工作行業、家庭型態、移民年數等因素，如

何個別地影響跨界生活，都有待後續的研究，進一步地釐清。

誌謝：本文初稿發表於 2007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台灣與東亞社會的比較研究」，台北：台灣大學。主要資料來源為國科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 (NSC95-2412-H-032-003)，謹此致謝。作者感謝耿曙在研討會上的評論，以及其他與會者的提問，尤其是《台灣社會學》兩位匿名審查人及編委會提供的修改意見。同時也特別感謝研究助理林欣潔及魏明如協助整理田野資料。《台灣社會學》編輯謝麗玲提供的專業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 上海市統計局(2005)表 3.11 主要年份在滬工作、居住的港澳台、境外常住人口，見上海統計年鑑 200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亦見上海市統計局「上海統計」網頁。<http://www.stats-sh.gov.cn/2005shtj/tjnj/node127/userobject1ai5980.html>
- (2006)表 3.4 主要年份常住人口，表 3.13 在滬外國常住人口，見上海統計年鑑 2006。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亦見上海市統計局「上海統計」網頁。<http://www.stats-sh.gov.cn/2003shtj/tjnj/2007tjnj/C0304.htm>，<http://www.stats-sh.gov.cn/2003shtj/tjnj/nj07.htm?d1=2007tjnj/C0313.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8)第七章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情況(二)，見中國投資指南。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亦見中國投資指南網頁。http://www.fdi.gov.cn/pub/FDI/wzyj/yjbg/zgwstzbg/2007chinainvestmentreport/t20080312_90331.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8)中國統計年鑑 2008。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 王宏仁、郭佩宜(2009)導論：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見王宏仁、郭佩宜編，*流轉跨界：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頁 1-32。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王振寰(1997)跨國界區域經濟形成的統理機制：以台灣資本外移南中國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7: 1-36。
- 胡蘇雲(2006)上海台灣人的社會融入分析。*社會科學* 8: 125-135。
- 耿曙(2002)「資訊人」抑或「台灣人」？大上海地區高科技台商的國家認同。國政研究報告 內政(研)091-061 號。台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 林祖嘉(1993)深圳地區台資企業營運調查報告。台北：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 陳彬(2000)移民上海：我的台灣經驗遇上海派作風。台北：商訊。
- 張茂桂(2006) *Diaspora 與想往家——關於大陳人生命經歷的研究*。2006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走出典範：五十年的台灣社會學」論文。台中：東海大學。
- 曾熾芬、吳介民(2006)夾縫中的公民：成員身分跨國化的政治。2006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走出典範：五十年的台灣社會學」論文。台中：東海大學。
- 經貿服務處編(1997)大陸地區台商協會會員名錄。台北：海峽交流基金會。
- 經濟部(1994)大陸投資廠商問卷調查分析報告。台北：經濟部。

- 鄧建邦(2008a)彈性下的限制：理解中國台幹的跨界工作流動與生活安排。研究台灣 3: 1-36。
- (2008b)性別、專業流動與生活劃界：女性台籍幹部在大上海與廣東。2008年台灣社會學年會：解嚴二十年台灣社會的整合與分歧會議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鄭陸霖(1999)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路重組下的生產外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5: 1-46。
- 趙彥寧(2001)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台北：巨流。
- 簡博秀、周志龍(2002)全球化、全球城市和中國都市發展策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7: 141-194。
- 龔宜君(2005)出路：台商在東南亞的社會形構。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Ang, Ien (2004) Beyond Transnational Nationalism: Questioning the Border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Global City. Pp. 179-196 in *State/Nation/Transnation: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edited by Brenda S.A. Yeoh and Katie Willis. London: Routledge.
- Anthias, Floya(1998) Evaluating Diaspora: Beyond Ethnicity? *Sociology* 32: 557-580.
- Apitzsch, Ursula (2003) Migrationsbiographien als Orte transnationaler Räume. Pp. 65-80 in *Migration, Biographie und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edited by Ursula Apitzsch and Mechtild M. Jansen. Münster, DE: Dampfboot.
- Basch, Linda, Nina Glick Schiller,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 (1997)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Amsterdam: Gordon and Breach.
- Beaverstock, Jonathan V. (2002) Transnational Elites in Global Cities: British Expatriates in Singapore's Financial District. *Geoforum* 33: 525-538.
- (2003) Transnational Elites in the City: British Highly-Skilled Migrants in New York City's Financial District. *GaWC Research Bulletin* 109. Leicestershire, UK: GaWC.
- Beck, Ulrich (2004) *The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razier, Jana Evans, and Anita Mannur (2003) Natio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Points of Contention in Diaspora studies Pp. 1-23 in *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edited by Jana Evans Brazier and Anita Mannur. Malden, MA: Blackwell.
- Butcher, Melissa (2006) White Collar Filipinos: Australian Professionals in Singapore. Pp. 172-192 in *Mobility, Labour Migration and Border Controls in Asia*, edited by

- Amarjit Kaur and Ian Metcalf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astles, Stephen (2000) *Ethnicity and Globalization: From Migrant Worker to Transnational Citizen*. London: Sage.
- Castles, Stephen, and Mark J. Miller (2003[1993]) *The Age of Migr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ohen, Robin (2008)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Eisenstadt, Shmuel N. (1953) Analysis of Patterns of Immigration and Absorption of Immigrants. *Population Studies* 7: 167-180.
- Faist, Thomas, ed. (2000a) *Transstaatliche Räume: Politik, Wirtschaft und Kultur in und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der Türkei*. Bielefeld, DE: Transcript.
- (2000b) Transnation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itizenship and Cultu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3(2): 189-222.
- Favell, Adrian, Miriam Feldblum, and Michael Peter Smith (2006) The Human Face of Global Mobility: A Research Agenda. Pp. 1-25 in *The Human Face of Global Mobility: International Highly Skilled Migration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the Asia-Pacific*, edited by Michael P. Smith and Adrian Favel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Fechter, Anne-Meike (2007) *Transnational Lives: Expatriates in Indonesia*. Aldershot, UK: Ashgate.
- Flick, Uwe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 Fu, William Zhengji (2001) Städtische Neustrukturierung in Shanghai nach den Reform: Die neue Rolle des Staates in der Globalisierung. *Peripherie* 81/82: 53-75.
- Glick Schiller, Nina, 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 (2004[1992]) 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Pp. 213-227 i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edited by Mohsen M. Mobasher and Mahmoud Sadri.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 Goldring, Luin (1999) Power and Status in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Pp. 162-186 in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edited by Ludger Pries. Aldershot, UK: Ashgate.
- Gomez, Edmund Terence (2007) Family Firms, Transnationalism and Generational Change: Chinese Enterprise in Britain and Malaysia. *East Asia* 24: 153-172.
- Gordon, Milton Myron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itsai, Olga (2005) Foreign and Local Professionals in the Moscow Offices of Global Business Service Companies. *GaWC Research Bulletin* 162. Leicestershire, UK: GaWC.
- Hannerz, Ulf (1990) Cosmopolitans and Locals in World Cultur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 237-251.
- (1996)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 (2004) *Foreign News: Exploring the World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unger, Uwe (2003) Brain drain oder brain gain: Migration und Entwicklung. Pp. 58-75 in *Migration im Spannungsfeld von Globalisierung und Nationalstaat*, edited by Dietrich Thränhardt and Uwe Hunger. Wiesbaden, DE: Westdeutscher Verlag.
- Iredale, Robyn (2001) The Migration of Professionals: Theories and Typolog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9(5): 7-26.
- Kaur, Amarjit, and Ian Metcalfe (2006) Introduction. Pp. 3-7 in *Mobility, Labour Migration and Border Controls in Asia*, edited by Amarjit Kaur and Ian Metcalf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Krumme, Helen (2004) Fortwährende Remigration. Das transnationale Pendeln türkischer Arbeitsmigrantinnen und Arbeitsmigranten im Ruhestand.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33(2): 138-153.
- Levitt, Peggy, and Mary C. Waters (2002)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Russel Sage.
- Massey, Douglas S. (1998) New Migrations, New Theories. Pp. 1-16 in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edited by Douglas S. Masse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ayer, Ruth (2005) *Diaspora. Eine kiritsche Begriffsbestimmung*. Bielefeld, DE: Transcript.
- Nassehi, Armin, and Markus Schroer (1999) Integration durch Staatsbürgerschaft? Einige gesellschaftstheoretische Zweifel. *Leviathan* 27(1): 95-112.
- Olwig, Karen Fog, and Ninna Nyberg Sørensen(2002) *Work and Migration: Life and Livelihood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 Panayiotopoulos, Prodromos (2006) *Immigrant enterprise in Europe and the USA*. London: Routledge.
- Phizacklea, Annie (2003) Transnationalism, Gender and Global Workers. Pp. 79-101 in

- Crossing Borders and Shifting Boundaries*, edited by Mirjana Morokvašić, Umut Erel, and Kyoko Shinozaki. Opladen, DE: Leske+Budrich.
- Pries, Ludger (2001) *Internationale Migration*. Bielefeld, DE: Transcript.
- Reden, Sandra (2000) *Über das Leben in der Fremde. Erfahrungen von Expatriate-Frauen in Bombay*. Magisterarbeit. Institut für Kulturanthropologie und Europäische Ethnologie. Marburg, DE: Marburg University.
- Roberts, Kenneth (2002) Female Labor Migrants to Shanghai: Temporary "Floaters" or Potential Settl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6(2): 492-519.
- Salt, John (1997) International Movements of the Highly Skilled.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3. Paris: OECD Publishing.
<http://econpapers.repec.org/paper/oecelsaab/3-en.htm>
- Sassen, Saskia (2000) Wem gehört die Stadt? Neue Ansprüche im Rahmen der Globalisierung. Pp. 7-37 in *Machtbeben: Wohin für die Globalisierung?* München, DE: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 Saxenian, AnnaLee (1999)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The Center for Comparative Immigration Studies, Working Paper 15.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ttp://www.ccis-ucsd.org/PUBLICATIONS/wrkg15.PDF>
- Schutz, Alfred (1944) The Stranger: An Essay in Social Psych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9(6): 499-507.
- (1976) The Homecomer. Pp. 106-119 in *Collected Papers II: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Arvid Brodersen. The Hauge, NL: Martinus Nijhoff.
- Sklair, Leslie (2001)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Oxford: Blackwell.
- Smith, Robert C. (2001) Comparing Local-level Swedish and Mexican Transnational Life. Pp. 37-58 in *New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Ludger Pries.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Michael Peter, and Luis Eduardo Guarnizo (1998)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Stepputat, Finn (2002) The Final Move? - Displaced Livelihoods and Collective Returns in Peru and Guatemala. Pp. 202-224 in *Work and Migration: Life and Livelihood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edited by Ninna Nyberg Sørensen and Karen Fog Olwig. New York: Routledge.
- Tsai, Ming-Chang, and Chin-Fen Chang (forthcoming) China-Bound for Jobs?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Connection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 Tseng, Yen-Fen (2000) The Mobility of Entrepreneurs and Capital: Taiwanese Capital-linked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 143-168.
- (2008) Taiwanese Middle Classes in Shanghai: Migration Patterns of Skilled Taiwanese to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aring Middle Classes in Ethnic Chinese Societies in Modern Asia-Pacific, Taipei, Taiwan.
- Wallraf, Wolfram (1996) Wirtschaftliche Integration im asiatisch-pazifischen Raum. *ASIEN* 59: 7-33.
- Wang, Feng, Zuo Xuejin, and Ruan Danching (2002)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Soci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6(2): 520-545.
- Weiss, Anja (2006) Hoch qualifizierte MigrantInnen. Der Kern einer transnationalen Mittelklasse? Pp. 283-300 in *Transnationale Karrieren: Biografien, Lebensführung und Mobilität* edited by Florian Kreuzer and Silke Roth. Wiesbaden, DE: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Wimmer, Andreas, and Nina Glick Schiller (2003)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Study of Migratio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3): 576-610.
- Wong, Lloyd L., and Michele Ng (2002) The Emergence of Small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 in Vancouver: The Case of Chinese Entrepreneur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6(3): 508-530.

網站

- 上海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 <http://shtx.site.hongxi.com>
- 中山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 <http://www.tbi.net.cn/tbisa/fuwu/index3.htm>
- 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 http://www.qgtql.cn/xhdt/gdtx/200509/t20050913_200437.htm (蘇州台協) ; http://www.qgtql.cn/xhdt/gdtx/200509/t20050909_199970.htm (昆山台協) ; http://www.qgtql.cn/xhdt/gdtx/200509/t20050913_200396.htm (東莞台協)
- 吳江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 <http://www.wj-tw.cn/shownews.asp?newsid=670>
- 深圳台商協會 <http://www.tmas.org/index.php?Model=new3&parentId=40&id=42>